

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边际？

——以反倾销为例的经验研究

王孝松

内容摘要：

已有考察贸易边际影响因素的文献大都强调了贸易成本的重要性，但并未明确考察贸易成本组成要素各自的作用。贸易成本中包含贸易壁垒因素会显著影响贸易流量，进一步地，将会影响贸易的增长方式，因而考察贸易壁垒对贸易边际的影响能揭示出贸易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对于探究贸易增长的影响和制约条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聚焦于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壁垒对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所产生的影响。

在考察期之初，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几乎相等，此后内涵边际份额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外延边际份额呈上升趋势，但变化趋势并非是线性的。在考察期内，内涵边际稳步上升，而外延边际具有较强的波动性。从总体上看，外延边际的年均增长率显著低于内涵边际的增长率。计量结果稳健地表明，贸易伙伴发起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出口增长的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并且反倾销措施对外延边际的抑制效应要大于对内涵边际的抑制效应。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出口贸易沿着外延边际增长更有利于分散出口风险、避免过分依赖于特定市场、特定产品的倾向，是未来中国出口持续性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贸易伙伴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出口的内涵边际与外延边际，而对外延边际产生的影响更为严重，这就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性增长提出了严峻挑战，使本已饱受质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雪上加霜。为此，中国各界至少要从两个维度思考未来经济发展的调整之路。一方面，需要探寻内外均衡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积极应对贸易壁垒，将贸易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关键词：反倾销；内涵边际；外延边际；抑制效应

一、引言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从改革开放以前近乎封闭的状态，到目前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对外贸易不仅使中国获取了丰厚的贸易利益，而且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2010年中国GDP已位居世界第二，而根据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计划（ICP）报告，以购买力平价核算，中国GDP将在2014年超过美国。在对外贸易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商品也在世界范围内遭遇了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例如，从WTO成立至今，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占全部案件比重已超过五分之一，不仅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反倾销对中国产品高筑贸易壁垒，而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频繁地通过反倾销措施限制中国产品进口，相当比重的对华反倾销案件最终导致了反倾销税的征收（表1）。国外发起的对华反倾销还在各行业间存在强度差异，例如在1996年至2010年间，有机化学品和钢铁制品被反倾销案件数分别为92次和90次，电机行业被征反倾销税率的平均值超过了100%（表2）。

表1 中国遭受反倾销与出口边际基本状况

年份	案件数	确认倾销数	确认损害数	平均税率	内涵边际(%)	外延边际(%)
1996	21	32	27	11.14	50.30	49.70

2000	44	15	16	7.27	43.53	56.47
2005	61	56	48	22.43	46.86	53.14
2006	49	52	53	18.22	41.38	58.62
2007	83	34	30	15.28	44.01	55.99
2008	59	66	59	29.54	51.10	48.90
2009	89	56	53	16.63	49.61	50.39
2010	86	74	71	26.26	51.86	48.44
平均值	55	41.67	38.27	19.38	45.85	54.15

数据来源：反倾销状况根据世界银行“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TTBD）”计算而得；出口边际根据 BACI 数据库计算而得。

表 2 中国遭受反倾销重点行业分布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案件数	确认倾销数	确认损害数	平均税率
29	有机化学品	92	67	65	71.08
73	钢铁制品	90	62	58	68.55
28	无机化学品	52	45	44	62.83
85	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	50	38	35	104.69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	37	27	24	83.40
72	钢铁	37	28	23	22.55
39	塑料及其制品	31	27	25	49.21
96	杂项制品	28	23	21	76.63
70	玻璃及其制品	26	14	11	37.2
87	车辆及其零件、附件（但铁道及电车道车辆除外）	24	18	14	52.83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TTBD）”计算而得。

在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总体背景下，国外发起的反倾销措施虽然未对贸易发展构成根本性破坏，但其对特定行业或特定产品的出口会造成严重的阻碍，甚至会带来灾难性损失，例如 2012 年欧盟对光伏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诉讼导致中国光伏产业濒于灭亡。已有研究表明，反倾销等贸易壁垒会对中国出口总额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抑制效应在不同行业、不同伙伴间存在显著差异（王孝松，2013）；与此同时，出口增长边际（the margin of export growth）问题目前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其特征及变化直接反应了一国对外贸易的扩张方式和发展前景（施炳展，2010），

Melitz（2003）开创的厂商异质性贸易理论奠定了“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的重要基础，目前已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新-新贸易理论不仅充分地解释了异质性企业的贸易模式，还将一国的出口增长成功地分解为“外延边际（the extensive margin）”和“内涵边际（the intensive margin）”，即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科学地计算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可以识别一国出口增长的来源，为巩固原有的比较优势和贸易地位、开拓新的贸易市场提供行动依据，同时也为在微观领域里进一步深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奠定了基础。

根据我们的初步测算，1996 年中国的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份额）几乎相等，分别为 50.3%和 49.7%，此后内涵边际份额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外延边际份额呈上升趋势，以至于在 15 年考察期内，二者的平均份额分别为 45.85%和 54.15%。但这种变

化趋势不是线性的，两种边际的份额变化不具有单调的时间趋势，2008年和2010年，内涵边际甚至增长至51%以上（表1）。既然外延边际的份额增长是总体趋势，为何其未能展示出逐年持续增长的特征？结合中国产品遭遇反倾销的实际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世界经济形势等影响因素外，中国产品遭遇的贸易壁垒可能也对出口边际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延边际的持续增长。

那么，贸易壁垒是否会对中国出口边际产生显著影响，影响方向如何，影响幅度多大，影响渠道有哪些，以及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将产生何种效应，本文将通过经验研究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旨在更好地把握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动力源泉，揭示出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制约条件，从理论上为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对贸易边际的研究

Eaton 和 Kortum（2002）在研究双边贸易、技术及地理因素时，分析了贸易份额随成本和地理障碍沿外延边际和内涵边际的变化，外延边际上的变化就是指贸易成本越高或位置越偏远，则出口产品种类越少；相对地，内涵边际上的调整是指贸易成本越高或地理障碍越大，留在贸易产品集中的种类不受影响，但在每种进口商品上的花费却越来越少。Ruhl（2003）使用异质性企业的理论框架证明了，贸易外延边际可以解释关于贸易壁垒的长短期弹性差异，Ruhl进一步指出，内涵边际上的增加（或减少）是指贸易商品贸易额的增加（或减少），外延边际上的增加则是指新贸易商品贸易流量的增加。Hummels 和 Klenow（2005）认为内涵边际还可进一步分解为价格和数量上的变化，因此，他们使用分解内涵边际的处理方法，包含了新产品种类的进口价格指数，明确给出了贸易二元边际的表达式。

众多文献基于各自对贸易边际的定义，对出口的二元边际进行了直接的测算。Bernard等(2003)对美国1986年至1992年间制造业贸易数据的分析证明了外延边际对于出口增长的重要作用。Kang(2004)使用韩国和台湾的出口数据，也证明了外延边际在促进出口增长方面的作用比内涵边际更大。Amiti 和 Freund(2007)使用中美双边贸易HS-10分位数据进行计算，发现从1992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种类增加了40%，但外延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仅为15%，中国对美出口增长主要源于内涵边际。Amurgo-Pacheco 和 Pierola(2008)使用HS-6分位贸易数据，分析了24个国家1990年至2005年的贸易流量，发现这些国家86%的出口增长来源于内涵边际，但外延边际在发展中国家正在提升。Eaton 等(2011)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法国出口增长，发现法国出口总量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法国出口企业数量的变化。

也有一些学者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出异质性厂商的相关参数，以此来判断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Felbermayr 和 Kohler(2006)通过估计一个双边贸易角点解引力模型，认为外延边际在1950年至1970年间，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贸易增长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但在其余年份，内涵边际的作用更为重要。Helpman 等(2008)证实了 Felbermayr 和 Kohler(2006)的结论，他们的考察期是1970年至1997年，经验结果表明，这一时期的贸易增长主要归功于内涵边际而非外延边际。Kancs(2007)基于一个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推导出了计量模型，对东南欧国家的企业异质性参数进行估计之后，分离可变和固定两类贸易成本对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的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着重强调了二元边际特别是外延边际的性质及福利含义。Bernard等(2007)指出，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贸易利得源于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可获得产品种类扩张的联合作用。然而，在企业层面上异质性模型的经验分析为贸易利得的源泉提供了额外的渠道：由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和高生产率企业的扩张（包括向海外市场的扩张，即出口）所共同推动的生产率进步。显然，外延边际是解释出口国生产率进步的重要机制（Bernard 等，2006；Feenstra

和 Kee, 2008)。另外, Bernard 等(2009)强调, 贸易伙伴间进出口波动主要取决于贸易的外延边际, 而一年以内的短期波动则主要受内涵边际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与 Hummels 和 Klenow(2005), 以及 Hausmann 和 Klinger(2006)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国内方面, 易靖韬(2010)使用浙江省数据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市场进入成本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影响。钱学峰和熊平(2010)实证描述了中国在多边层面和双边层面上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内涵边际实现的, 而外延边际在贸易总量中的比重很小, 并且分析了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 主要有经济规模、工人生产率水平等。施炳展(2010)运用 Hummels 和 Klenow(2005)的方法将中国出口增长分解为广度增长、数量增长和价格增长, 发现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低、数量高, 且中国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广度增长和数量增长造成的, 价格对出口的增长几乎没有贡献。杨春艳、孔庆峰(2011)指出, 中国在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方面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 从而导致中国对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容易呈现波动性增长。

(二) 贸易政策效应的研究

对贸易政策效应的分析, 即考察贸易政策措施、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与争端等造成的各种影响, 包括对贸易本身的影响和对经济运行中其他方面的影响。较为重要的综述性文献有 Feenstra(1995)、Kolev 和 Prusa(1999), 以及 Blonigen 和 Prusa(2001)。

所谓贸易政策对贸易本身的影响, 即直接效应, 是指贸易干预政策实施之后, 一国的进出口数量和价格会受到的影响。Anderson 和 Neary(1992)构建了“贸易限制指数”, 用以衡量非关税壁垒对贸易流量的限制作用, Frankel(1997)考察了建立欧共体(关税同盟)对成员国双边贸易量的影响, Vandenbussche 和 Zanardi(2006)考察了反倾销在全球范围内对贸易量的抑制作用, Handley 和 Limão(2012)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条件下欧洲厂商贸易量的变化情况。国内方面, 鲍晓华(2007)考察了中国实施反倾销对进口量的影响, 王孝松等(2010)考察了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量的影响。

所谓对经济运行中其他方面的影响, 即间接效应, 是指贸易政策对市场供求、企业竞争策略等微观经济活动以及对进出口国的产业结构、投资区位、就业、福利等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Bernard 和 Jensen(1995, 1998)分别考察了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以及对生产率水平的影响, Rodriguez 和 Rodrik(2001)考察了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Trefler(2004)考察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对厂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Brambilla 等(2008)分析了反倾销对相关部门工作者收入水平的影响。国内方面, 胡昭玲(2003)的研究表明, 在一定条件下, 中国实施贸易干预可以起到从国外企业转移利润、支持本国企业竞争和提高国民福利的作用。詹政、冯宗宪(2011)指出, 中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会对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和利润产生影响。

(三) 贸易成本对贸易边际的影响

在出口边际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的背景下, 众多学者考察了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其中考察不同的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成为研究重点。Eaton 等(2004)对法国企业出口的分析表明, 当总量变化是由于贸易成本的变化导致时, 外延边际的变化也最显著。Amurgo-Pacheco 和 Pierola(2008)的研究则表明, 贸易成本的下降将有利于两种边际的增长。Das 等(2007), 以及 Eaton 等(2008)通过模拟市场进入成本的下降, 都发现了对贸易的扩大作用主要来自外延边际。Bernard 等(2007)证明了理解目标市场的 GDP 和两地间距离影响贸易总量的关键在于外延边际。Anderson(2007)通过对瑞典企业层面出口数据的经验研究, 认为固定成本对外延边际的作用大于对内涵边际的作用。Lawless(2008)分析多种影响贸易成本的因素对美国出口企业的作用, 也发现贸易成本的变动主要作用于外延边际。Frensch(2009)在一个引力模型框架下, 考察了欧洲新兴经济体贸易自由化对各类进口品二元边际的影响。这些研究得到一个类似的结论, 那就是贸易自由化意味着贸易量将主要沿着外延边际发生显著调整。

国内方面，钱学锋（2008）通过宏观数据对出口增长进行产品层面的二元边际分解，结果表明在2003年至2006年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内涵边际，而模拟的贸易成本下降发现对外延边际的影响更大。陈勇兵等（2012）的经验结果表明，2000年至2005年间，尽管中国出口的外延边际波动幅度远大于集约边际，但出口增长主要是由持续出口企业的贸易额扩大实现的，经济规模、距离和贸易成本的变动主要通过外延边际影响贸易流量。陈阵、隋岩（2013）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发现，贸易成本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其中对中国出口企业数量的影响尤为显著。

实际上，作为贸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税及各种非关税壁垒会对出口的二元边际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已有的研究则鲜有考察贸易壁垒对出口边际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大多数文献使用地理距离、运输费用、完成进出口程序费用等来测度贸易成本；另一方面，一些文献模拟关税下降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对出口边际产生的影响，并非使用实际数据进行定量研究。本文则在行业层面上，将中国出口的二元边际同出口产品遭遇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匹配起来，考察反倾销这一重要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出口边际产生的实际影响，这不仅是对贸易政策效应，以及出口边际影响因素文献的有益补充，而且对于理解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影响和制约条件、促进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中国出口边际的测算

尽管目前已经涌现出众多针对贸易边际的研究，但学者们对“二元边际”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测量方法。综合主要的研究成果来看，“外延边际”源于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出口产品种类增加或新产品种类创造；“内涵边际”则源于现有出口企业或原有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出口数量的扩张。

（一）计算方法

由于不同文献对贸易边际的定义存在差别，因而计算方法也各不相同。Felbermayr 和 Kohler（2006）基于国家层面，认为贸易的外延边际主要是指出口国和其他国家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Hummels和Klenow（2005）基于产品层面，在对贸易总量进行分解之后，强调贸易的外延边际是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Helpman等（2008）基于企业视角，认为外延边际就是指出口企业的数目，而内涵边际是指每个出口企业的平均贸易额。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措施对出口边际的影响作用，而反倾销措施是基于特定产品展开的，因此本文计算出口边际的方法，从本质上是基于Hummels和Klenow（2005）产品层面的视角。为与本文实证分析所需的控制变量相匹配，我们基于行业层面计算出口边际，同时在行业层面上统计反倾销措施。具体地，我们使用CEPII的BACI数据库中HS-6分位贸易数据进行计算，计算过程分为三步。

第一步，基于HS-2分位编码划分行业，计算特定年份特定行业中包含的出口贸易项目的数量，即“产品-国家对”的数量 N_{kt} ，其中 k 为行业， t 为年份。以 $\#$ 表示贸易项目数量，

下标 j 表示产品， i 表示贸易伙伴，则 $N_{kt} = \sum_{jit} \#_{jit}$ 即为行业 k 出口的外延边际。

第二步，计算各行业的贸易额 $X_{kt} = \sum_{jek} X_{jit}$ ，即将行业 k 内的每一项贸易额加总。

第三步，用各行业贸易额除以该行业的“产品-国家对”数量，即得到该行业每项出口的平均金额 $I_{kt} = X_{kt} / N_{kt}$ ，以此作为行业 k 出口的内涵边际。

我们使用的方法简单、明晰，虽然没有采用复杂的统计或计量方法，但计算过程是紧扣Hummels和Klenow（2005）的定义展开的，能够体现“内涵”增长和“外延”增长的核心

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计算结果得出了跨行业的面板数据，可以很好地同许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相匹配，从而为定量分析中国出口边际的影响因素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二）计算结果及特征分析

本文的考察期为 1996 年至 2010 年，我们首先报告中国出口边际的总体变化趋势。将每一年度各行业出口的内涵边际取平均值，再取对数，即得到图 1 展示的数据。可以看出，内涵边际在考察期内稳步上升，2008 年和 2009 年，内涵边际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有所下降，其余年份均较快增长。用类似的方法可以得到图 2 所展示的外延边际变化趋势，显然，中国出口的外延边际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其变化趋势同内涵边际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入世以前，外延边际持续波动，起伏不定，并无规律可循，2001 年之后，外延边际逐年增长，但 2005 年有所回落，2006 年开始较大幅度增长，除 2009 年之外，外延边际持续增长，并且 2010 年已超过 2008 年的水平。

相对而言，出口贸易沿着外延边际增长更有利于规避收入波动，提升出口国产品多样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减少贸易条件恶化的风险（钱学锋、熊平，2010）。中国对外贸易经过多年持续增长，不仅在数量上迅猛增长，而且在结构上也有所优化（王孝松、谢申祥，2012），那么有理由相信，贸易增长方式也将趋于更为稳健、抗风险能力更强的外延边际增长。但由图 2 所展示，外延边际并非持续增长，结合中国遭遇严酷反倾销的现实，可以推测反倾销等贸易壁垒将会对外延边际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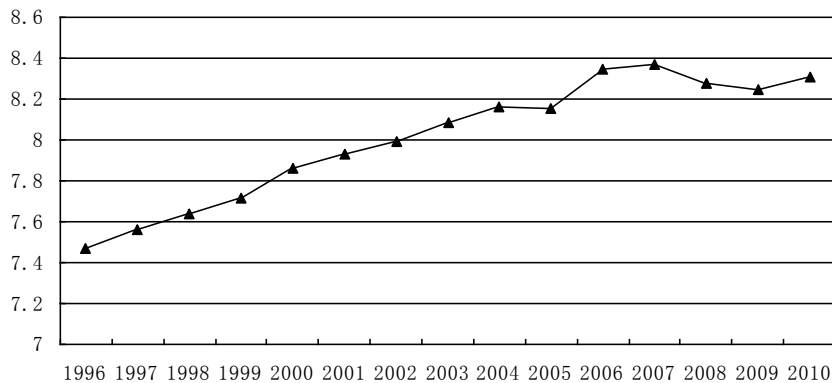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出口内涵边际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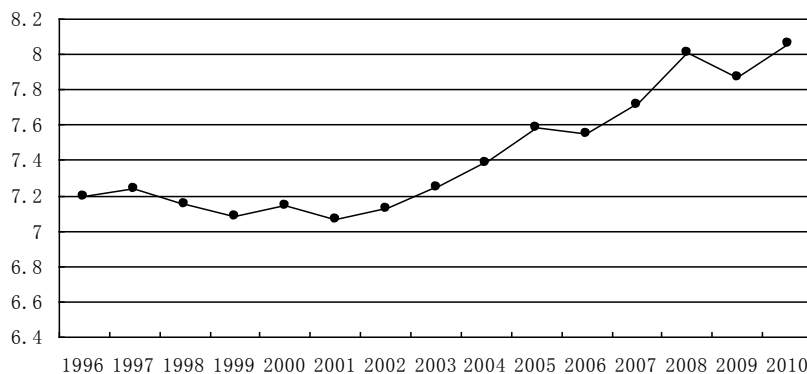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出口外延边际的变化趋势

考察各行业出口边际的增长状况，特别是外延边际的增长状况，不仅能更为细致地展示二元边际的计算结果，并且更符合 Hummels 和 Klenow（2005）对外延边际的定义，能揭示出二元边际的动态发展。由表 3 所示，各行业出口边际的增长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从内涵边际来看，武器行业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而镍及其制品行业位居第二，增长率均超过了 37%。排在前十位的行业中，既有谷物、橡胶制品等农产品加工行业，又有船舶、钢铁、车辆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而内涵边际增幅较慢的有乳品、蛋品、天然蜂蜜行业，肉食及食用杂碎行业，烟草行业等，甚至纺织部门中有两个行业的内涵边际在考察期内负增长。

在外延边际方面，各行业的年均增长率较为集中，增长率最高的行业（肥料行业）仅为 12.2%，另外还有钢铁、铁道及电道机车、可可等七个行业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 20%。但在考察期内，没有一个行业的外延边际年均增长率为负，增长率最低的为肉食及食用杂碎、活动物两个部门，均低于 1%。从总体平均值来看，内涵边际的年均增长率为 9.2%，而外延边际的年均增长率为 6.35%，约为内涵边际的 70%。

总体来看，无论是内涵边际，还是外延边际，各行业的增长率并无规律可循。增长率高的行业中，既包含传统部门，又包含新兴部门；增长率低的行业也是如此。这就引发了我们进一步定量研究的兴趣：各行业出口边际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贸易壁垒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表 3 中国各行业出口边际增长率排名

名次	行业 编号	行业名称	内涵边际年 均增长率(%)	行业 编号	行业名称	外延边际年 均增长率(%)
1	93	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	37.37	31	肥料	12.21
2	75	镍及其制品	37.26	72	钢铁	11.75
3	10	谷物	26.81	86	铁道及电车道机车、车辆及其 零件;	11.71
4	31	肥料	24.34	18	可及可可制品	11.04
5	89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	19.32	75	镍及其制品	10.66
6	35	蛋白类物质;改性淀粉;胶;酶	18.58	89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	10.39
7	72	钢铁	17.74	76	铝及其制品	10.25
8	59	浸渍、涂布、包覆或层压的 纺织物;工业用纺织制品	16.29	47	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 回收(废碎)纸或纸板	10.22
9	40	橡胶及其制品	15.80	59	浸渍、涂布、包覆或层压的纺 织物;工业用纺织制品	9.42
10	87	车辆及其零件、附件,但铁道 及电车道车辆除外	15.63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 器具及零件	8.57
.....						
87	55	化学纤维短纤	2.54	43	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3.42
88	51	羊毛、动物毛	2.47	42	皮革制品	3.40
89	25	盐;硫磺;泥土及石料;石膏料、 石灰及水泥	1.90	50	蚕丝	3.24
90	67	已加工羽毛、羽绒及其制品; 人造花;人发制品	1.34	46	稻草、秸秆、针茅或其他编结 材料制品;篮筐及柳条编结品	3.21
91	4	乳品、蛋品、天然蜂蜜	0.84	64	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2.82
92	78	铅及其制品	0.74	14	编结用植物材料;其他植物产 品	2.31

93	2	肉食及食用杂碎	0.37	5	其他动物产品	1.92
94	24	烟草	0.36	95	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	1.71
95	53	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纸纱线及其机织物	-0.56	2	肉食及食用杂碎	0.65
96	50	蚕丝	-2.08	1	活动物	0.16
平均值			9.20			6.35

四、出口边际的影响因素

(一) 指标选取与数据描述

在本文的计量模型中,出口的二元边际为被解释变量,是根据 CEPII 的 BACI 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而得。该变量为包含 15 年、96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为克服异方差等问题,我们对二元边际取了对数。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中国产品遭遇反倾销状况,我们使用五个指标作为反倾销的代理变量。一是在特定年份,贸易伙伴是否针对某一行业的商品发起反倾销诉讼 *Initiation*,这是一个 0-1 变量,仅表明相关行业的商品是否遭遇了反倾销;二是在特定年份,贸易伙伴针对中国某一行业的商品发起反倾销诉讼的案件数量 *Number*;三是在特定年份,中国遭遇的反倾销诉讼中被确认倾销的数量 *Dumping*;四是在特定年份,中国遭遇的反倾销诉讼中被确认构成损害的数量 *Injury*;五是在特定年份,某一行业面临的来自贸易伙伴的平均反倾销率 *Dutyrate*。反倾销对内涵边际的作用机制主要源于贸易限制效应 (Trade destruction effect),即反倾销措施增加涉案产品的成本从而导致该产品已有的贸易联系受到抑制。反倾销抑制外延边际的机制则较为复杂,一方面,贸易限制效应发挥到极致,将会使已有的贸易联系不复存在,即导致行业出口的“产品-国家对”数量减少;另一方面,贸易抑制效应 (Trade depression effect) 会从整体上抑制中国涉案产品的出口,即导致中国产品无法出口到未发起反倾销诉讼的国家,这同样会导致外延边际下降;此外,还可能发生贸易偏转效应 (Trade deflection effect),即反倾销措施可能会促使中国企业另谋销路,将涉案产品出口到第三方市场,这将导致外延边际的扩张。¹因此我们预期以上五个变量同内涵边际显著负相关,同外延边际的关系不确定,取决于反倾销对贸易所产生三种效应的力量对比。这些反倾销变量均根据 Bown 教授创立的“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 (TTBD)”中的原始数据整理而得。²

为尽可能控制出口边际的其他影响因素,我们在计量模型中纳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世界经济形势决定了贸易伙伴的收入水平,进而决定了其进口需求能力,因此当世界经济繁荣时,中国贸易增长的内涵边际与外延边际将会提高。我们使用世界 GDP 年均增长率来测度世界经济形势,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³

显性比较优势 (RCA) 指数是一国比较优势的外在表现,一行业若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则该行业会从事出口。显性比较优势越强,出口的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增长越快,因而预期 RCA 指数同被解释变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基于 HS-2 分位代码所划分的行业,我们计算

了中国各行业的 RCA 指数,具体地, $RCA_k^c = \frac{X_k^c / X^c}{X_k / X}$, 其中 X_k^c 代表中国行业 k 的出口额,

¹ 关于反倾销措施产生贸易效应的具体论述,参见 Bown 和 Crowley (2007)。

² 网址为 http://people.brandeis.edu/~cbown/global_ad/。

³ 网址为 <http://data.worldbank.org/>。

X^c 代表中国总出口, X_k 代表行业 k 的世界出口额, X 为世界总出口。⁴ 这样, RCA 指数的含义是: 行业 k 在中国的出口份额与行业 k 在世界的出口份额之比。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 Comtrade 统计数据库。⁵

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 会发生产业内贸易, 即一国既会出口又会进口某一行业的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表明一国贸易产品的差异程度越高, 因而出口的产品种类越多, 这意味着外延边际的扩大; 但产业内贸易程度与内涵边际的关系则不确定。具

体地, 产业内贸易指数 $IIT_k^c = \frac{|X_k^c - M_k^c|}{X_k^c + M_k^c}$, 其中 X_k^c 和 M_k^c 分别表示中国 k 行业的出口额和

进口额。原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 Comtrade 统计数据库。

在国际外包和生产分割盛行的背景下, 中国广泛参与到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之中, 从东亚经济体购买中间产品, 在国内制造成最终产品之后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三角贸易”。中国的特定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越深入, 则该行业贸易的产品种类越多、也会增加每类产品的贸易额, 因此我们预期产品内分工的参与程度同外延边际和内涵边际呈正相关关系。我们使用“出口产品价值中的进口要素含量”来测度产品内分工程

度, 即 $IPT_k^c = \frac{a_k^c}{X_k^c}$, 其中 IPT 表示产品内分工指数, a_k^c 表示中国行业 k 中间产品的进口额,

X_k^c 表示中国 k 行业的出口额。⁶

本文重点考察的是非关税壁垒对中国出口边际的影响作用, 但与此同时, 传统关税壁垒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贸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税将对出口边际产生抑制效应。由于世界各国的关税水平千差万别, 而中国对一些国家的出口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使用世界各国关税水平的简单平均将无法反映中国产品面临的真实关税壁垒。我们使用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对象——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经济体各行业关税的平均值 $Tariff$, 作为中国面临关税壁垒的代表, 数据来源于 WTO 官方网站。⁷

近年来, 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的情况下, 各国广泛参与自由贸易协定 (FTA), 旨在同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相互取消贸易壁垒、促进贸易发展。目前中国也积极参与 FTA, 截至 2013 年末, 中国已同贸易伙伴签署 11 个 FTA。由于 FTA 内部成员之间实行自由贸易, 所以我们预期, 随着中国参与 FTA 数量的增加, 中国出口边际将会有所扩展。变量 FTA 为年度数据, 表示各年度中国参与 FTA 的数量, 来源于 WTO 官方网站。⁸

本文考察期跨度较长, 覆盖了中国入世前后 15 年的时间。由于中国入世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充分激发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潜能, 因而可以预期, 入世之后中国出口的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均会扩展。我们使用虚拟变量 WTO 来表示中国入世状况, 1996 年至 2001 年, 该变量取值为 0, 2002 年以后取值为 1。

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使用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的数值。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于表 4 之中。

表 4 描述性统计

⁴ 为简化起见, 我们省去了每个变量中表示年份的下标 t 。

⁵ 网址为 <http://comtrade.un.org/db/dqQuickQuery.aspx>。

⁶ 中间产品的进口额使用该行业的零部件进口来测度, 零部件产品的确定是按照 BEC 分类标准进行的。

⁷ 网址为 <http://tariffanalysis.wto.org/default.aspx>。

⁸ 网址为 <http://rtais.wto.org/UI/PublicSearchByMemberResult.aspx?lang=1&membercode=156&redirect=1>。

变量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预期符号	
				内涵边际	外延边际
被解释变量					
<i>Intensive</i>	中国出口增长内涵边际的对数值	7.020	0.937		
<i>Extensive</i>	中国出口增长外延边际的对数值	7.219	1.277		
解释变量					
<i>Initiation</i>	是否针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诉讼	0.241	0.428	-	?
<i>Number</i>	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数	0.573	1.489	-	?
<i>Dumping</i>	确认中国商品倾销案件数	0.434	1.150	-	?
<i>Injury</i>	确认中国商品构成损害案件数	0.399	1.088	-	?
<i>Dutyrate</i>	中国商品面临的反倾销税率(%)	19.384	74.380	-	?
<i>GDP</i>	世界GDP增长率(%)	5.300	5.391	+	+
<i>RCA</i>	中国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1.741	2.122	+	+
<i>IIT</i>	中国各行业产业内贸易比重	0.497	0.318	?	+
<i>IPT</i>	中国各行业产品内分工指数	0.258	0.047	+	+
<i>Tariff</i>	美、欧、日各行业税率的平均值	5.895	8.436	-	-
<i>FTA</i>	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协定数量	2.733	3.044	+	+
<i>WTO</i>	中国入世虚拟变量(2002年以后=1)	0.600	0.490	+	+

资料来源：详见文中所述

(二) 计量结果及分析

1、反倾销对内涵边际的影响

以中国出口的内涵边际为被解释变量，以特定行业是否遭遇反倾销措施为解释变量，同时纳入上文所列的一系列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列于表5第(1)列中。*Initiation*的估计系数为-0.253，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贸易伙伴发起对华反倾销会显著抑制中国出口贸易沿着内涵边际扩张。其原因在于，对于已经建立起的贸易联系，反倾销诉讼一经发起，无论裁定结果如何，都会起到震慑作用，即产生所谓的“调查效应”(Staiger和Wolak, 1994)，阻碍了中国特定商品向发起国出口。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大多同预期相符，并且显著。*RCA*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会沿着内涵边际不断扩张，从而维持并强化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指数*II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特定行业发生的双向贸易(既出口又进口)显著抑制了该行业特定产品向特定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以零部件进口份额测度的产品内分工指数*IP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具有开拓市场、促进贸易增长的作用。以主要贸易伙伴的平均关税*Tariff*来表示中国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关税壁垒的程度，结果表明关税显著增加了贸易成本，从而抑制了中国出口沿内涵边际扩张。同预期相符，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FTA*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会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总体的发展，还会使出口贸易沿着内涵边际扩张。

*GDP*的估计系数为正，却不显著，表明出口增长的内涵边际更多地受与贸易相关的变量影响，而经济增长等宏观因素对出口内涵边际并未产生实质性效果。中国入世虚拟变量*WTO*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中国入世前后的内涵边际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计量方程整体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计量模型不存在严重的自相关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核心估计结果是可信的：贸易伙伴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措施，会起到威慑的作用，从而抑制了中国出口的内涵边际增长。

表5的(2)至(5)列是依次变换反倾销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第(2)列的结果显示,贸易伙伴发起的反倾销数量会显著抑制特定行业出口沿着内涵边际扩张。简单的0-1变量 *Initiation* 只能反映贸易伙伴对华反倾销诉讼是否发起,而变量 *Number* 展示出了特定行业遭受反倾销的频率,可以揭示出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的强度。一行业遭受的反倾销诉讼越多,则反倾销对该行业出口的威慑作用越强,对已有贸易联系的抑制作用就非常明显。同第(1)列相似, *RCA*、*IPT*、*FTA* 等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Tariff*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预期符号不确定的 *IIT* 显著为负,初步证实了产业内贸易会抑制内涵边际增长。*GDP* 和 *WTO* 两个变量仍不显著。同第(1)列结果对比,可以看出估计结果十分稳健:不仅各控制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一致,而且估计值也非常接近。

类似的,使用确认倾销数量、确认损害数量和平均反倾销税率进行回归,结果依然十分稳健。这样的计量结果一致表明,贸易伙伴的反倾销措施产生了明显的贸易保护效应,显著抑制了中国出口贸易沿着内涵边际扩张。

表5 中国出口内涵边际的影响因素

	(1)	(2)	(3)	(4)	(5)
常数	6.543*** (0.062)	6.560*** (0.062)	6.561*** (0.062)	6.562*** (0.062)	6.557*** (0.062)
<i>Initiation</i>	-0.253*** (0.051)				
<i>Number</i>		-0.058*** (0.015)			
<i>Dumping</i>			-0.064*** (0.019)		
<i>Injury</i>				-0.066*** (0.020)	
<i>Dutyrate</i>					-0.001*** (0.0002)
<i>GDP</i>	0.007 (0.005)	0.008 (0.005)	0.007 (0.005)	0.008 (0.005)	0.007 (0.005)
<i>RCA</i>	0.123*** (0.011)	0.123*** (0.011)	0.124*** (0.011)	0.124*** (0.011)	0.124*** (0.011)
<i>IIT</i>	-0.351*** (0.076)	-0.329*** (0.076)	-0.322*** (0.076)	-0.322*** (0.076)	-0.300*** (0.076)
<i>IPT</i>	0.129** (0.063)	0.131*** (0.060)	0.133*** (0.058)	0.132*** (0.052)	0.133*** (0.055)
<i>Tariff</i>	-0.011*** (0.002)	-0.011*** (0.002)	-0.011*** (0.002)	-0.011*** (0.002)	-0.011*** (0.002)
<i>FTA</i>	0.110*** (0.011)	0.111*** (0.011)	0.111*** (0.011)	0.110*** (0.011)	0.113*** (0.011)
<i>WTO</i>	-0.026 (0.080)	-0.033 (0.080)	-0.028 (0.080)	-0.027 (0.080)	-0.034 (0.080)
调整的 R^2	0.243	0.238	0.236	0.236	0.235
<i>DW</i> 值	1.986	1.898	1.869	1.869	1.930
<i>F</i> 值	66.97	65.36	64.53	64.46	64.28

括号中为标准差，***、**与*分别表示估计的系数在 1%、5%与 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6 至表 8 中的含义与此相同。

本文使用的是跨行业、多年份的面板数据，可以纳入固定效应控制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表 6 (a) 报告了纳入行业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这可以控制行业自身存在的可能影响贸易边际的种种特征。本文最为关注的是反倾销变量，可以看出，五个变量在各自的计量方程中均显著为负，再次表明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内涵边际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而且，无论是反倾销的发起，还是做出肯定裁定，或是最终征税，都会抑制中国出口沿着内涵边际扩张。与表 5 中结果的差异在于，表 6 (a) 中的 *Dumping* 和 *Injury* 两个变量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由于加入了行业固定效应，确认倾销和损害对内涵边际的影响作用被固定效应部分吸收，因而呈现出显著性略有下降的特征。在表 6 (a) 的估计结果中，我们发现 *GDP* 显著为正，而 *IIT* 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其余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 5 相同。

纳入时间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可以控制每一年份各自呈现出的可能影响贸易边际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估计时需要舍弃掉与时间固定效应完全共线的变量，即仅随时间、不随行业变化的 *GDP*、*FTA* 和 *WTO* 三个变量。由表 6 (b) 可见，计量结果依然支持了贸易壁垒显著抑制中国出口内涵边际的核心结论。此外，纳入方程中的四个控制变量均显著，且符号与预期相符。这就充分体现出本文计量结果的稳健性。

加入固定效应后，方程的拟合优度显著提高，各计量方程的 R^2 均超过 0.9，特别是纳入时间固定效应后， R^2 在五个方程中均保持在 0.99 以上。计量模型均通过了各种基本的统计检验，表明我们的计量结果具有较强的可信性。

表6 中国出口内涵边际的影响因素：纳入固定效应的估计

(a) 纳入行业固定效应

	(1)	(2)	(3)	(4)	(5)
常数	6.342*** (0.038)	6.342*** (0.038)	6.363*** (0.026)	6.364*** (0.026)	6.362*** (0.026)
<i>Initiation</i>	-0.201*** (0.025)				
<i>Number</i>		-0.128*** (0.007)			
<i>Dumping</i>			-0.014** (0.006)		
<i>Injury</i>				-0.012** (0.006)	
<i>Dutyrate</i>					-0.032*** (0.007)
<i>GDP</i>	0.008*** (0.002)	0.008*** (0.002)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i>RCA</i>	0.184*** (0.012)	0.183*** (0.012)	0.175*** (0.008)	0.176*** (0.008)	0.177*** (0.008)
<i>IIT</i>	0.017	0.021	0.003	0.001	0.002

	(0.053)	(0.053)	(0.038)	(0.038)	(0.038)
	0.104***	0.103***	0.092**	0.100***	0.105***
<i>IPT</i>	(0.038)	(0.035)	(0.047)	(0.039)	(0.041)
	-0.005***	-0.006***	-0.006***	-0.005***	-0.005***
<i>Tariff</i>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116***	0.116***	0.113***	0.113***	0.114***
<i>FTA</i>	(0.004)	(0.004)	(0.002)	(0.002)	(0.002)
	-0.024	-0.027	0.018	0.018	0.019
<i>WTO</i>	(0.028)	(0.028)	(0.017)	(0.018)	(0.018)
调整的 R^2	0.908	0.908	0.910	0.907	0.913
<i>DW</i> 值	1.706	1.710	1.800	1.799	1.797
<i>F</i> 值	140.89	141.15	148.04	137.73	142.90

(b) 纳入时间固定效应

	(1)	(2)	(3)	(4)	(5)
常数	6.884***	6.864***	6.869***	6.871***	6.858***
	(0.028)	(0.027)	(0.027)	(0.027)	(0.027)
	-0.135***				
<i>Initiation</i>	(0.023)				
		-0.031***			
<i>Number</i>		(0.007)			
			-0.035***		
<i>Dumping</i>			(0.009)		
				-0.036***	
<i>Injury</i>				(0.009)	
					-0.003**
<i>Dutyrate</i>					(0.0016)
	0.126***	0.131***	0.132***	0.132***	0.133***
<i>RCA</i>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395***	-0.353***	-0.359***	-0.360***	-0.334***
<i>IIT</i>	(0.036)	(0.035)	(0.035)	(0.035)	(0.036)
	0.129***	0.126***	0.124***	0.124***	0.125***
<i>IPT</i>	(0.035)	(0.030)	(0.032)	(0.033)	(0.031)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i>Tariff</i>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调整的 R^2	0.992	0.992	0.993	0.992	0.992
<i>DW</i> 值	1.768	1.704	1.699	1.705	1.618
<i>F</i> 值	88.32	84.02	88.12	83.62	83.64

2、反倾销对外延边际的影响

出口贸易沿着外延边际增长有利于避免过分依赖某些重要产品和某些重要市场的弊端，体现了出口活动中分散风险的策略和市场多元化取向，因而贸易壁垒对外延边际的影响是我们更为关注的问题。特别地，根据我们对反倾销影响外延边际机制的理解，反倾销变量同外延边际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更增加了我们探寻二者关系的强烈兴趣。

以中国出口的外延边际为被解释变量，以特定行业是否遭遇反倾销措施为解释变量，同时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列于表 7 第（1）列中。*Initiation* 的估计系数为-1.583，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对华反倾销申诉会显著抑制中国出口的外延边际。这样的结果初步表明，反倾销所产生的贸易限制效应和贸易抑制效应之和，明显大于贸易偏转效应，反倾销措施从发起环节就会显著抑制中国出口贸易沿着外延边际扩张。同表 5 第（1）列结果相比，*Initiation* 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增大，意味着反倾销申诉的发起对外延边际产生的抑制效应要大于对内涵边际产生的效应。

同预期相符，*RCA*、*IIT*、*IPT*、*FTA* 等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Tariff*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特别指出的是，我们预期中国特定行业参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贸易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越高，因而该行业出口种类多、外延边际扩张，计量结果支持了这一预期。*GDP* 和 *WTO* 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世界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未对中国出口的外延边际产生显著影响，外延边际在中国入世前后也未发生显著变化。

计量方程通过了各项统计性检验，初步证实了反倾销对中国外延边际的抑制效应。

表 7 的（2）至（5）列为依次替换反倾销变量之后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反倾销变量均显著为负，其他控制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大多同第（1）列一致，并且除个别变量外，估计系数的取值范围同第（1）列十分接近。这表明我们的估计结果十分稳健，多次估计一致证实了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外延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需要指出的是，以外延边际为被解释变量时，反倾销变量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以内涵边际为被解释变量的情形，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产品遭遇的反倾销措施会对外延边际的扩张构成更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

当纳入固定效应之后，主要的估计结果并未发生变化。无论是加入行业固定效应，还是纳入时间固定效应，反倾销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也大多同预期相符，计量方程整体上显著、拟合优度很高，且不存在严重的自相关问题。这样的估计结果稳健地表明，在考察期内，中国出口的外延边际显著受到了贸易伙伴反倾销措施的抑制，如果在国际市场未遭受反倾销措施，中国出口将朝着更多产品、更广阔市场的方向发展，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了重要的威胁和阻碍。

表7 中国出口外延边际的影响因素

	(1)	(2)	(3)	(4)	(5)
常数	6.232*** (0.077)	6.337*** (0.081)	6.346*** (0.082)	6.351*** (0.083)	6.331*** (0.089)
<i>Initiation</i>	-1.583*** (0.064)				
<i>Number</i>		-0.396*** (0.019)			
<i>Dumping</i>			-0.479*** (0.026)		
<i>Injury</i>				-0.492*** (0.027)	
<i>Dutyrate</i>					-0.004*** (0.0004)
<i>GDP</i>	0.008 (0.006)	0.012* (0.007)	0.008 (0.007)	0.009 (0.007)	0.008 (0.007)
<i>RCA</i>	0.076***	0.078***	0.083***	0.082***	0.086***

	(0.014)	(0.015)	(0.015)	(0.015)	(0.016)
	0.526***	0.637***	0.663***	0.668***	0.860***
<i>IIT</i>	(0.095)	(0.100)	(0.101)	(0.102)	(0.108)
	0.091***	0.090***	0.092***	0.090**	0.094***
<i>IPT</i>	(0.037)	(0.038)	(0.035)	(0.044)	(0.031)
	-0.008***	-0.010***	-0.010***	-0.011***	-0.013***
<i>Tariff</i>	(0.003)	(0.003)	(0.003)	(0.003)	(0.004)
	0.020***	0.024*	0.021	0.020	0.040***
<i>FTA</i>	(0.013)	(0.014)	(0.014)	(0.014)	(0.016)
	0.257	0.204*	0.235	0.244**	0.225**
<i>WTO</i>	(0.100)	(0.105)	(0.206)	(0.107)	(0.115)
调整的 R^2	0.360	0.296	0.269	0.259	0.152
<i>DW</i> 值	1.421	2.520	2.180	2.125	1.623
<i>F</i> 值	116.74	87.50	76.84	72.89	37.95

表8 中国出口外延边际的影响因素：纳入固定效应的估计

(a) 纳入行业固定效应

	(1)	(2)	(3)	(4)	(5)
常数	6.748***	6.751***	6.752***	6.751***	6.751***
	(0.020)	(0.020)	(0.020)	(0.020)	(0.020)
	-0.038***				
<i>Initiation</i>	(0.012)				
		-0.041***			
<i>Number</i>		(0.004)			
			-0.013***		
<i>Dumping</i>			(0.004)		
				-0.003***	
<i>Injury</i>				(0.0004)	
					-0.039***
<i>Dutyrate</i>					(0.006)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i>GDP</i>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54***	0.054***	0.055***	0.055***	0.055***
<i>RCA</i>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106***	0.111***	0.108***	0.110***	0.109***
<i>IIT</i>	(0.029)	(0.029)	(0.029)	(0.029)	(0.029)
	0.077***	0.078***	0.075***	0.075***	0.077***
<i>IPT</i>	(0.018)	(0.020)	(0.020)	(0.021)	(0.024)
	-0.021***	-0.022***	-0.021***	-0.022***	-0.024**
<i>Tariff</i>	(0.010)	(0.011)	(0.010)	(0.012)	(0.013)
	0.033***	0.034***	0.034***	0.034***	0.034***
<i>FTA</i>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300	0.301	0.302***	0.302***	0.301***
<i>WTO</i>	(0.014)	(0.014)	(0.014)	(0.014)	(0.014)

调整的 R^2	0.980	0.984	0.983	0.985	0.984
DW 值	1.894	1.886	1.887	1.888	1.887
F 值	325.07	327.77	334.53	329.26	330.12

(b) 纳入时间固定效应

	(1)	(2)	(3)	(4)	(5)
常数	6.652*** (0.034)	6.762*** (0.033)	6.764*** (0.033)	6.777*** (0.033)	6.808*** (0.036)
<i>Initiation</i>	-1.362*** (0.046)				
<i>Number</i>		-0.331*** (0.018)			
<i>Dumping</i>			-0.369*** (0.022)		
<i>Injury</i>				-0.379*** (0.023)	
<i>Dutyrate</i>					0.003** (0.0003)
<i>RCA</i>	0.056*** (0.007)	0.045*** (0.007)	0.046*** (0.007)	0.044*** (0.007)	0.044*** (0.008)
<i>IIT</i>	0.349*** (0.042)	0.516*** (0.041)	0.540*** (0.041)	0.535*** (0.042)	0.661*** (0.044)
<i>IPT</i>	0.085*** (0.021)	0.078*** (0.022)	0.082*** (0.025)	0.080*** (0.022)	0.081*** (0.022)
<i>Tariff</i>	-0.014*** (0.002)	-0.020*** (0.002)	-0.020*** (0.002)	-0.021*** (0.002)	-0.022*** (0.002)
调整的 R^2	0.991	0.995	0.994	0.993	0.992
DW 值	1.686	1.660	2.083	2.027	2.128
F 值	87.07	155.30	131.46	118.85	101.07

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聚焦于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壁垒对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所产生的影响。将 HS-6 分位贸易数据归并到 96 个行业之中，我们计算了每个行业在 1996 年至 2020 年之间的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按照 HS-2 分位代码划分行业，我们将中国在世界市场上遭遇反倾销的涉案产品归并到相应的行业之中，使用 5 个变量来测度中国产品遭遇反倾销状况，在控制一系列变量的条件下，定量考察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边际的影响效应。

在考察期之初，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几乎相等，此后内涵边际份额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外延边际份额呈上升趋势，但变化趋势并非是线性的，外延边际的份额并未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在考察期内，内涵边际稳步上升，而外延边际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在入世之后外延边际逐年增长，虽经 2005 年的短暂回落，但此后又大幅增长，并且其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要小于内涵边际。各行业出口边际的增长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并无规律可循。从总体上看，外延边际的年均增长率显著低于内涵边际的增长率。

计量结果稳健地表明，贸易伙伴发起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出口增长的内涵边际

和外延边际，无论是反倾销的发起，还是案件的肯定性裁定，或是反倾销税的征收，都对我国出口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计量结果还表明，反倾销措施对外延边际的抑制效应要大于对内涵边际的抑制效应。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出口贸易沿着外延边际增长更有利于分散出口风险、避免过分依赖于特定市场、特定产品的倾向，是未来我国出口持续性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贸易伙伴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我国出口的内涵边际与外延边际，而对外延边际产生的影响更为严重，这就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性增长提出了严峻挑战，使本已饱受质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雪上加霜。为此，我国各界至少要从两个维度思考未来经济发展的调整之路。

一方面，探寻内外均衡的发展路径。在世界全部反倾销案件中，涉及我国产品的案件超过了五分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和我国产品自身存在的问题。一些产品确实存在价格过低、扰乱贸易伙伴市场的现象，但更多的情形是，贸易伙伴不满于我国产品抢占本地市场，因而使用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作为贸易保护的手段，打压我国产品，甚至一些国家兼具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目标，旨在通过贸易领域的打压全面震慑我国。由此可见，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面临严酷的反倾销等保护措施将成为常态，只要我国出口形势良好，即使是正常的贸易行为也难以避免反倾销保护。那么，避免过分依赖外部市场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培育国内购买能力、矫正扭曲的市场结构将是未来各界的努力方向。

另一方面，积极应对贸易壁垒，将贸易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内外平衡的发展路径并不意味着放弃国际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实，外向型发展战略、特别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功不可没，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要充分挖掘外部市场。那么，在我国产品遭受反倾销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涉案企业和行业协会要积极应对。在完善自身实力、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不断实现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勇于面对反倾销等贸易摩擦与争端，积极应诉、据理力争，同国外相关利益群体协调沟通，争取获得对自身有利的裁定结果，使反倾销等贸易措施对出口边际、特别是外延边际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参考文献：

1. 鲍晓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救济效果评估，《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 陈阵、隋岩“贸易成本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多产品企业视角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
3. 陈勇兵、陈宇媚、周世民，“贸易成本、企业出口动态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2000-2005”，《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11卷第4期
4. 胡昭玲，战略性贸易政策应用于中国轿车业量化效果的再考察，《当代经济科学》2003年第6期
5. 钱学锋，“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6. 钱学锋、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7. 施炳展，“中国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4期
8. 王孝松，“反倾销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出口贸易”，《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9. 王孝松、李坤望、包群、谢申祥，“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评估——来自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0年第4期。
10. 王孝松、谢申祥，“中国究竟为何遭遇反倾销——基于跨国跨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12期。
11. 王孝松、谢申祥，“对外贸易差额结构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第12期。
12. 杨春艳、孔庆峰，“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基于贸易二元边际的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年第3期。

13. 易靖韬, “企业异质性、市场进入成本、技术溢出效应与出口参与决定”, 《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
14. 詹政、冯宗宪, “贸易政策对企业国际竞争力及境外资源利用的影响”, 《国际经贸探索》2011年第3期
15. Amiti, M. and C. Freund, 2007, “An Anatomy of China’s Trade Growt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rade Conference, IMF.
16. Amurgo- Pacheco, A. and M. D. Pierola, 2008, “Patterns of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473.
17. Andersson, M. , 2007, “Entry Costs and Adjustments on the Extensive: An Analysis of How Familiarity Breeds Exports” , CESIS Working Paper No. 81.
18. Anderson James E. and J. Peter Neary, 1994. “Measuring the Restrictiveness of Trade Policy”.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 Bernard A. and Jensen B (1995), ‘Exporters, Jobs and Wages in U.S. Manufacturing, 1976-1987’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icroeconomics, 67-119
20. Bernard, A. B., and J. B. Jensen. (1998). Exporting and productivity. Presented at 1998 Summer Institute, NBER, Cambridge, MA.
21. Bernard, A. B. , J. Eaton, J. B. Jensen and S. Kortum, 2003, “Plant 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4), pp. 1268- 1290.
22. Bernard, A. B. , J. B. Jensen, and P. K. Schott , 2006, “Trade Costs, Firms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3 (1) , pp. 917- 937.
23. Bernard, A. B. , J. B. Jensen, S. J. Redding and P. K. Schott, 2007, “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21(3) , pp. 105- 130.
24. Bernard, A. B. , J. B. Jensen, S. J. Redding and P. K. Schott , 2009, “The Margins of U. S.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662.
25. Blonigen, Bruce A. and Thomas J. Prusa. 2001. “Antidumping,” NBER Working Paper, W8398.
26. Bown, C., P., and Crowley, M., A., “Trade Deflection and Trade Depres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72, 176—201.
27. Brambilla, I., G. Porto, and A. Tarozzi, 2008, “Adjusting to Trade Policy: Evidence from U.S. Antidumping Duties on Vietnamese Catfish”,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495
28. Eaton, Jonathan, and Samuel Kortum. 2002.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Econometrica*, 70(5): 1741—1779.
29. Eaton, J. , S. Kortum and F. Kramarz, 2004, “An Anat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s”, New York University, Mimeo.
30. Eaton, J. , E. Marcela, K. Maurice. Export Dynamics in Colombia: Transactions Level Evidence. Borradores de Economía, 2008, No. 522.
31. Eaton, J., S. Kortum and F. Kramarz, “An Anat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s”, *Econometrica*, 79 (5) pp. 1453–1498, 2011
32. Feenstra, Robert C., 1995.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G. M. Feenstra, R. and H. L. Kee, 2008, “Export Variety and Country Productivity: Estimating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odel with Endogenous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4 (2) , pp. 500- 518.
33. Felbermayr, G. J. and W. Kohler, 2006, “Exploring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World Trade”,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2 (4), pp. 642- 674.
34. Frankel, J. A. (1997). *Regional Trading Bloc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35. Frensch, R. 2010.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mport Margins."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46(3): 4-22.
36. Grossman & K. Rogoff (e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dition 1, volume 3, chapter 30, pages 1553-1595 Elsevier.
37. Handley Kyle and Nuno Limão, 2012. "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790
38. Hausmann, R. and B. Klinger, 2006,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atter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Product Space", CID Working Paper, No. 128.
39. Helpman, E. , M. J. Melitz and Y. Rubinstein, 2008, "Estimating Trade Flows: Trading Partners and Trading Volum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23(2) , pp. 441- 487.
40. Hummels, David, and Peter J. Klenow. 2005.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3):704–723.
41. Kancs, d' A. , 2007, "Trade Growth in a Heterogeneous Firm Model: Evidence from South Eastern Europe" , *World Economy*, 30, pp. 1139- 1169.
42. Kang, K. , 2004, "The Path of the Extensive Margin (Export Variety) : Theory and Evid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Working Paper, mimeo.
43. Kolev Dobrin R. and Thomas J. Prusa. 1999. "Dumping and Double Cro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st-Based Trade Policy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6986
44. Lawless, M., "Deconstructing Gravity: Trade Costs and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s", MPRA Paper, No. 10230, 2008
45. Rodriguez Francisco and Dani Rodrik. 2001.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k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in Ben S. Bernanke and Kenneth Rogoff, ed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0, Volume 15 MIT Press
46. Ruhl, Kim. 2003. "Solving the Elasticity Puzzl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meo.
47. Staiger, R.W., and Wolak, F.A., "Measuring Industry Specific Protection: Antidump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icroeconomics*, 51–118, 1994.
48. Trefler, D., 2004, "The Long and Short of the Canada-U.S. Free Trade Agree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 No. 4, pp. 870-895.
49. Vandenbussche, H., and M. Zanardi, 2006, "The Global Chilling Effects of Antidumping Proliferation", CEPR Working Paper, No 5597.